



咫尺之內瞻萬里之遙——記我所知的劉顯叔先生

張 璉 國立東華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兼圖書館館長退休
輔仁大學圖書資訊系兼任副教授

一、引 言

依您的個性，定不許人撰文懷念。

令賢妻四年前謝世，膝下無子，臨終交代晚輩，不發訃、免儀式，火化後海葬。生時瀟灑，死亦如此。最後幾月您承受病痛，謝絕老友老同事的探望，二月中旬因拗不過我，至府上看您時已清癯虛弱，您一向坐在客廳南向的景窗邊，我和您話家常，您聊沒兩句就得喘息一下。那是最後一見。

36年前，承蒙王振鵠館長汲引，開啟我人生上半場的圖書館生涯。初入漢學中心資料組，全組只有兩人，正確說法就您一位，我是唯一的新成員，因我的加入才打破此組兩年的寂靜。此後與您同單位共事16年，直至我轉赴東華大學另闢職涯為止，三年後您也屆齡退休了，此間同事陸續增加，皆來來去去，我的精華歲月29至45歲與您朝夕相處，是主管與部屬，也亦師亦友，後面的20年則為友朋之誼。

您一派瀟灑、來去如風，年長又資深，一般人常感覺孤傲神秘而高不可攀。受曾淑賢館長託囑撰文紀念，我義不容辭，不敢言所識多深，謹就親歷親聞，以敬慎之筆留下一抹回憶。

二、狂狷進守一名士

早期中央圖書館（現稱國家圖書館）有個優

良傳統，除對館長、主任加上職稱外，館內同仁皆以姓相稱，如王先生、李小姐，全館男士只有他姓劉，「劉先生」成為他的特屬專稱，久而久之也含敬重之意。比他更資深的汪雁秋主任以前曾半玩笑的說，以前我們稱他劉少爺，後來改口稱劉老爺，這都是私底下輕鬆的稱呼。

賞書畫、知典故、評美食、品甜點，熱愛檯燈、杯子、好筆，甚至是對椅子也有獨到鑑賞。猶記得，我剛上班不久，某日穿雙新鞋來，他問多少錢買的，我說八百，他說，那怎麼能穿，要穿一兩千塊錢皮製的才是鞋，我望著腳上精挑細選的仿皮鞋，有點尷尬，當時薪資才一萬出頭，但這話影響深遠，日後我挑鞋的品味也提升。然而，他並不奢華，也不追求名牌，而是自有一番品味與癖好，是館內公認的名士。

日常見他必是西裝筆挺，搭上有品味的領帶，外加一只領帶夾，領帶質料色澤皆上選，曾見他搭配鑲有珍珠的領帶夾，而珍珠在他身上竟是不俗。其實，早年夏天，他喜著青年裝，翻領不打領帶，不必外罩長袖西服，涼爽簡單又不失正式，那是當年因應能源危機而普及的公務員裝，不少高級公職者多會穿，市面上也有賣的。很長一段時間，一入炎夏，他便穿上量身訂製青年裝，合身又有精神，毫無制服之感，後來才漸不穿。

說到癖好，我雖未必皆知，但可略舉一二，如



飯後必吃甜點才算餐畢；嗜吃巧克力、起士蛋糕；對八條通的日本料理、秀蘭小館酸菜黃魚、麗水街的長春藤西餐、新生南路普一點心，還有希爾頓大理石蛋糕、義式濃縮咖啡、東區潮州菜……不勝枚舉，都經他品鑑掛保證的。那些可口的點心也不時出現在午後的辦公室裡，有好些年，他藉春酒之名，請同仁們大啖福華江南春的江浙名菜與精緻點心，溫婉賢淑又精明能幹的劉夫人也必在座。無論吃什麼、穿什麼、用什麼，都有他特有的品味。

不串門、不道長短，也不受獎，例如服務滿二十年政府頒發服務獎章時，他缺席，說無人能頒獎給他；不愛照相，團體照常不見他蹤影，萬不得已才在最後一排露臉；與人相處，如遇衝突或爭執，常常是禮讓而不與人爭。

他說，人最大的敵人是自己，制伏自己才是勇者。辦公室裡曾發生一樁驚險事件，有位精神狀況不穩的女同事，某日突朝他飆罵，接著揮拳，打落他的眼鏡，鏡片破碎，幸未傷及臉部，他壓制情緒血脈賁張卻未發火責備，這是何等大的自制力，又是何等的修養。

晚明文人廣好交友，欣賞狂狷不羈、有深情、有真氣的名士。如袁宏道說：「世人但有殊癖，終身不易，便是名士。」名士無不狂狷，狂者，不拘一格、敢做敢為；狷者，潔身自好、有所不為，合則為有進有守之人。張岱不也說過：「人無癖，不可與交，以其無深情也；人無疵，不可與交，以其無真氣也。」認為結交有癖有疵之人，才得見深情真氣，倘藉晚明文人觀點描寫劉先生似也頗適切。

三、雪泥鴻爪無所執

劉先生早年留學京都大學，是宮崎市定（1901-1995）的學生，名校又是名師，人人稱

羨。他說，玩了四年沒拿碩士學位，何以如此，回說，何必在乎學位。

他畢業於臺大歷史系，大四寫畢業論文時，在圖書館無意間發現一本未編目的宮崎市定《九品官人法の研究》，尚不懂日文，卻對書中研究方法感興趣，便致函宮崎市定請益，竟獲宮崎親贈此書，這是莫大鼓勵。服兵役，在空軍學校擔任教官，閒暇時捧著字典學日文，並閱讀宮崎市定《雍正帝》，日文能力大增。退伍後參加公費留考，日文卷子竟默書宮崎市定一小段文章，獲得84高分；原本分發至東京大學，他執意進京都大學，終於如願，卻從學於吉川幸次郎，但感興味不合，轉而投入宮崎市定門下。宮崎市定是日本著名的歷史學家，內藤湖南嫡傳弟子，擅長宏大敘事，把瑣碎史料置於大時空下論述，是公認京都學派二代傳人，如此大師怎未追隨到底？

十多年前，我側面得知當年他因一口流利的京片子，被日本人懷疑是中國特務，在學校受到排擠，連當時的同學濱島敦俊也誤會。1990年代末濱島教授應聘到暨南大學任教，曾向幾位臺灣學者透露，對當年誤會劉先生事感到歉疚，後來再聽說，濱島在一席餐會上已當面向他致歉。關於早年留日被誤會的事從未聽他提起過，不知當年遭怎樣的刁難，四年的時間不短，且有名師親炙，應足夠澄清釋疑，然而他遊遍京都各角落也是事實，最後向京都大學輕揮衣袖，未帶走任何雲彩。

話說，他有一口京片子，卻是道地的雲林西螺人，祖籍福建漳州。民國30年太平洋戰爭爆發，臺灣遭美軍轟炸而動盪不安，劉父舉家遷至北京（當時稱北平）經商，約於37年返臺，劉先生從4到10歲的童年是在北京度過，大約住潘家園附近，也在那裡上過小學，如今那區已是熱鬧的古玩舊貨市場。10歲之前的語言學習力最強，從此烙下京味十



足的口音，即使回臺就學及至成年，口音皆未變，也因此遭日本人誤會。後來也令來臺交流的大陸學者驚奇，時任吉林省圖書館館長金恩輝在〈海峽兩岸古籍整理學術交流之我見我思〉記道：「年紀與我相仿，他同我談起中華古籍的輝煌和北京街頭的風味小吃……如數家珍，他在言談話語中不時流露出來的『北京味』，連我這個曾經在北京生活過四年的吉林人也望塵莫及。」（《中國圖書館學報》，1998:2）劉先生的口音與童年記憶都讓人印象深刻。

引發他負笈東瀛的《九品官人法の研究》（1956年），乃宮崎市定的經典之作，開啟日本學界對中國中古史的各项研究，獲得學士院獎，是日本最高的學術大獎。劉先生多少受其濡染，回國後發表過幾篇文章，如〈近六十年來國人對魏晉南北朝史的研究〉（《史學彙刊》第4期，民60.12），他綜論自民初以來六十年間兩岸中古史的研究成果，當時兩岸不通聲息，卻能掌握1949年之後大陸的研究概況，做出詳瞻而系統的評述，誠屬不易。又如另外兩篇，〈東漢魏晉的清流士大夫與儒學大族〉（《簡牘學報》第5期，民66.01）與〈論魏末政爭中的黨派分際〉（《史學彙刊》第9期，民67.10），這是前後相關連的文章，詳析曹魏以來士大夫集團與儒學大族之間的分化演變，從政權、黨派、族群、理念等面向，論述魏晉遞嬗政爭的流變，皆是旁徵博引、考證翔實且立論有據。

儘管他的學術作品甚少，且皆為四十多年前之作，卻都擲地有聲，迄今仍是治魏晉史的後學者須參考的，他也曾受聘於文大、成大歷史系講授魏晉史。如此看來，學位之於他，有無又何妨。

四、事功實則惠澤長

民國57年初，劉先生進入中央圖書館採訪組，當時館長是屈萬里。民國62年新任館長諸家駿延攬

他至秘書室，時年35，迄至67年王振鵠館長上任的次年，擔任秘書五年。他卻對我說，有人說他不務正業，被諸館長調至身邊就近看管，此話明顯過謙了。諸館長原是美國羅徹斯特大學東亞圖書館主任，回國接任中央圖書館館長，自是有理想抱負，作風率直，人脈亦廣，如積極參與IFLA會議、美國東亞學會等，都為央圖開拓國際能見度。他任內有兩件大事，民國62年省立臺北圖書館改制為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，兩個館從原先競合關係轉為總館分館的從屬關係，其間的複雜與難度可想而知；其次是民國64年美國國會圖書館館長布思定Boosten夫婦訪臺，由中央圖書館負責全程接待，責任與意義皆重大。據當時入館不久的顧敏先生（民國97-99年任館長）回憶，他說：「當年諸家駿館長都處理得四平八穩。」，「劉先生是諸館長的良佐，兩人個性互補，依諸館長的個性，定是有人獻策與建議。」並說：「他為諸館長排解許多紛爭與麻煩，在那個階段無論館內館外，都起到平衡與調和的作用。」足見，劉先生在秘書職任上表現不凡。

35年的公職生涯，前半期是館長的得力佐助；後半期在資料蒐集上發揮功力。民國六十年代後期臺灣在經貿產業上已跨出一大步，當時行政院長孫運璿為提升國內學術研究環境，指示教育部籌設漢學研究資料中心，教育部委由中央圖書館兼辦，王振鵠館長承此重任，籌備期汪雁秋主任亦奔走出力不少，民國70年成立「漢學研究資料及服務中心」（76年更為今名），以加強漢學資源及提供國內外漢學服務為目標，上設諮詢性質的指導委員會，下設資料組與聯絡組，劉先生出任資料組組長，自此展現他資料蒐集的工夫。

兩年後我報到，青年大樓二樓，只見一排排大陸書籍與期刊，地上一落落未拆封的書箱，還有

一些從日本影印的精裝古籍，這就是當年初創的光景。所有的書都亟待編目，我即刻學習辨認簡體字，手寫編製目錄卡片、打印書標，為每一本書賦予意義。當其時，劉先生經常與書商洽談，包括與漢珍公司交涉採購美國UMI(University Microfilms)的學位論文，從微捲轉成紙本，每冊以美金計價，十分昂貴。如今已是領頭羊的漢珍數位圖書公司老闆朱瑄先生，當時是剛創業起步的年輕人，有一回聊起，他說他就是從UMI論文起家的，早年受劉先生許多支持與鼓勵，此話一點不假。

資料蒐集看似容易，實則不然，須對出版有敏銳洞察力、博知學術價值，且能盱衡時勢、人脈廣闊，否則難收成效，以上特點劉先生俱集於一身。不出幾年已見規模，展現在三方面，一是完整蒐集美國各大學有關漢學(Sinology)及中國學研究(Chinese Studies)的博碩士論文，入藏最早一本是十九世紀末的博士論文。其二，蒐集日本所藏的善本古籍，篩選自內閣文庫、尊經閣文庫、宮內廳文庫等，以明代文集、經義之書及方志為主，這批域外漢籍不僅充實國內的漢學資源，也使原已頗豐的明人文集更臻齊全，為維持古書真貌，由日本高橋寫真株式會社以特殊相紙印製，並以精裝裝幀，入館後皆悉數複印一套，以為流通之用。

另一大成果是大陸出版品，以文史哲、藝術、考古等領域為主。今在書市、網路皆能買到，但解嚴之前(1987年)不准進口，漢學中心是少數特許進口大陸資料的單位，除挑選漢學領域書刊外，一些不易取得的「內部發行」刊物，如1960年起出版《文史資料選輯》及部分內部期刊，皆能完整蒐集，由於文史資料大部分是親歷者執筆或口述，是中國近現代史的重要史料，大陸學者對此皆稱道，在大陸很少有蒐藏如此齊全的圖書館。此外，他也致力蒐藏《複印報刊資料》，這是人民大學書報中

心自1958年起輯選人文社會科學的期刊文獻，經整理編輯後再依主題發行的刊物，如今已轉型生產資料庫，但在數位化之前，紙本《複印報刊資料》是集人社領域學術文獻的精華，為國內學界提供豐富的研究資源。

退休多年的張錦郎編纂曾在接受某刊物訪問時，提及當年編製《中國文化研究論文目錄》，獲劉先生提供個人珍藏完整的《明報月刊》，「我如獲至寶地親自將有關文史哲的論文全部抄在卡片上，計得1053張。」要之，期刊如缺期，仿若書籍脫頁不完整，劉先生對期刊學報講求完整齊全的精神，令工具書專家張編纂亦佩服不已。

資料蒐集背後的辛勤是看不見的，但強化國內漢學研究資源，為國家圖書館增添了特色典藏，乃是有目共睹。



劉顯叔先生於漢學中心資料組服務時舊影

五、咫尺之內瞻萬里之遙

20多年前我聽他提及對裴頠「崇有論」的興趣，亦見過未完成的手稿，直至數天前，查得他在2006年發表〈裴頠及其「崇有論」索解二題〉(《六朝學刊》於2期)，琢磨多年終於問世了，此篇文章有助於對他更深的認識。裴頠出身西晉的儒學大族，為糾正當時充斥玄學貴無、不務實的流風而作崇有論，欲藉「有」的理論闡述秩序與規範。

從這篇文章的關懷視角及對文本字句的考證，皆顯示出劉先生求真務實的一面，與他外在流露的樣貌很不一樣，這也印證前面談到他蒐集資料的長才與敬業精神。

民國93年2月，劉先生屆齡退休，起先還走訪大陸古籍單位及同道好友，後來年事漸高便少走動。兩岸古籍整理學界交流始自民國85年4月漢學中心舉辦「兩岸古籍整理學術研討會」，率先為圖書館界、文史學界搭起友誼的橋樑，引起不小的迴響，事後南京大學古典文獻研究所所長周勛初、吉林省圖書館館長金恩輝等皆有專文紀念，一晃24年，兩岸在此基礎上持續擴大交流。日前我將劉先生辭世消息轉告北大教授、全國高校古籍整理委員會主任安平秋先生，他以簡訊覆我：「他是一個善良、真誠、正直，有品味的人，我很喜歡他。這兩年我身體不如前，和他聯繫少了，他離世，我很難過……。」他們因兩岸古籍會議而結緣，是相知相惜的老朋友，如今亦年邁，但友誼長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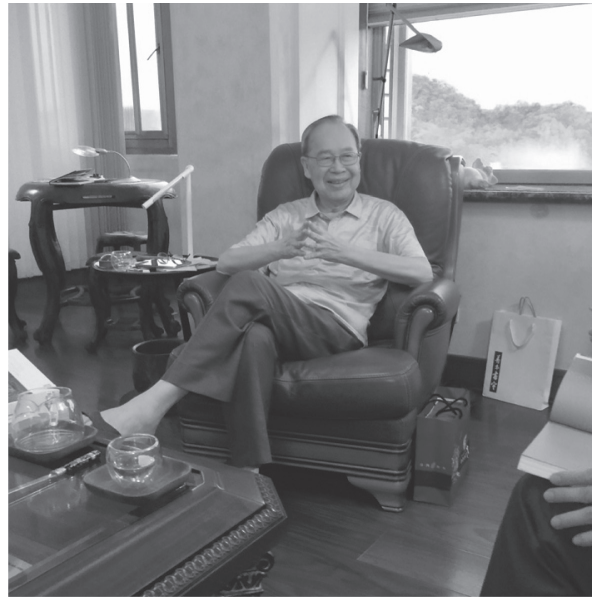
劉先生嘗自稱「圖書館摺客」，意欲拉開自己與圖書館的距離，然而他一輩子在圖書館，用力於斯、栽種於斯，卻又若即若離，興許也是名士作風使然。若說他一生奉獻給圖書館，毋寧說是奉獻給書，他洞悉出版、博知務實、精於蒐藏、心不離書，是另類圖書館的守護者。

六、後記

以上所記，是我所知道的您，視角所及仍是有限。我想說，生活中您有品、有味、有癖、有好，治學任事上是有所為、有所不為的君子，一生認

真崇實地奉獻於書，以紮實的事功惠澤於後人。

最末，感謝汪雁秋主任、張錦郎編纂、顧敏館長接受訪問，提供寶貴信息，衷心致謝。



劉顯叔先生於家中客廳(108年8月23日)



約民國76、77年參加同事蔣祖詒先生婚禮喜宴

左為劉顯叔先生，右為筆者。

註：蔣祖詒為蔣復璁之子，曾在漢學中心資料組工作約3年。